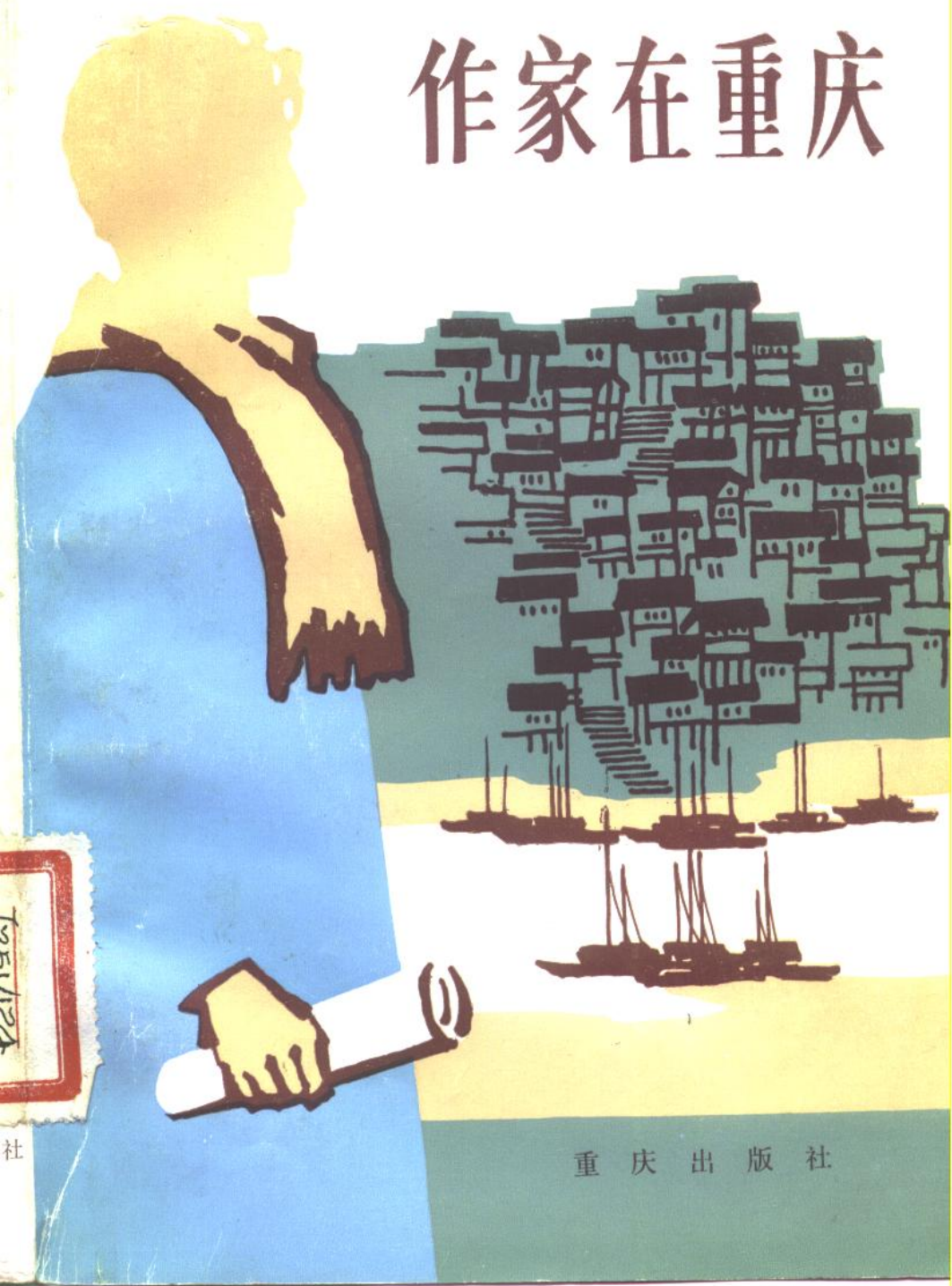


作家在重庆



1945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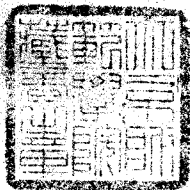
重 庆 出 版 社

作家在重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9360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949360

作家在重庆

重庆出版社编辑、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插页6 字数131千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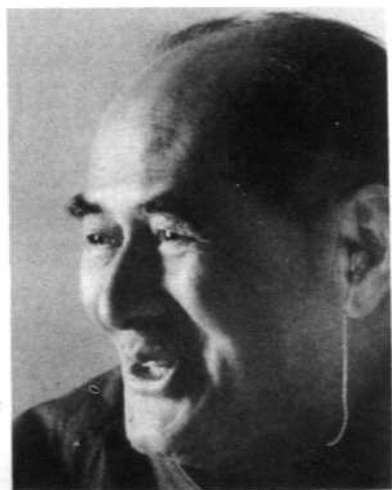
书号：10114·66

定价：0.73元



碧野

八一年摄于重庆



徐迟



方殷



丰村(左)和骆宾基
摄于八一年秋鲁迅墓前



陈瘦竹



赵清阁



前排右起 臧克家 王亚平
后排右起 柳 倩 臧云远 力 扬

四六年摄于重庆



隋树森



高士其



田 涛



田仲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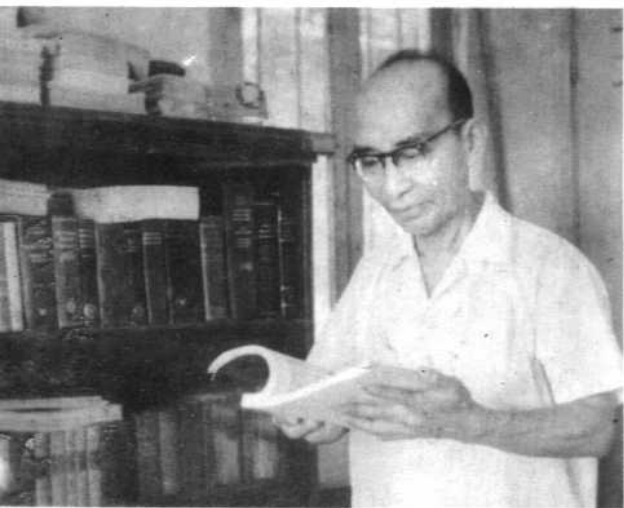
戈 茅



雷石榆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扬州



李霁野
一九四五年在四川白沙



方敬



赵铭彝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是大批知名作家、诗人、戏剧家的云集之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设在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一时间进步文艺活动生气勃勃，对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起到了重大作用。从那时到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新华日报》也设在重庆。在《新华日报》的周围，团结了整个进步文艺界和各界爱国人士，他们联合一致，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展开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三、四十年，旧中国早已一去不返，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迈步在四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上。但是，历史不应被遗忘，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有关那个时期的进步文艺界的工作与斗争，作家们当时的创作活动和他们所经受的生活的磨难等等，如实

地记载下来。这不但能够给今后整理、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对于广大文学青年来说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了解过去、珍惜现在的活教材。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约请了曾在重庆生活过的部分作家撰写回忆文章，并将其汇编成书。如有可能，此后还将陆续选编，以尽我们的责任。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对我们的工作热情支持、积极撰稿的方殷、王亚平两位同志先后逝世了，我们谨在这里寄以悼念之忱。

编 者

(10082/27)

目 录

10082/27

回忆与祝愿.....	碧 野	1
重庆回忆.....	徐 迟	22
鄞都来去.....	丰 村	35
入川出川.....	方 殷	58
初到重庆.....	陈瘦竹	65
行云散记.....	赵清阁	71
白沙琐忆.....	隋树森	78
少见太阳多见雾.....	臧克家	89
散忆重庆.....	田 涛	118
重庆琐忆.....	田仲济	122

雾茫茫山城诗话	臧云远	126
从延安到重庆	高士其	142
战争年代在重庆	戈 茅	152
回忆途经重庆时节	雷石榆	157
在重庆学习毛主席《讲话》	臧云远	161
较场口事件目睹记	王亚平	164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文学活动	李霁野	167
回忆老舍	田 涛	175
以群在重庆	方 敬	179
关于中国艺术剧社的创办始末	赵铭彝	187

碧 野

回忆与祝愿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路过重庆，以激动的心情站在长江大桥的桥头上，遥望山城。隔江，那岗峦起伏处，是重重迭迭的建筑群。我注目凝思，这就是我青年时代流浪过的城市么？

回想这几十年来，我的生活道路盘旋曲折，有时爬山，有时涉水，有时走沼泽，有时穿密林，疲乏劳苦，备尝艰辛。但远方总有一点亮光在招引着自己，哪怕那只是黑夜中的一粒半明不灭的灯火，或者是一颗在云隙间微微闪烁的星星，也会鼓舞自己的勇气和坚定自己的信心，继续前行。

一九四一年，为了追求理想的实现，我怀着美好的愿望，越过秦岭，奔过成都平原，来到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重庆。我第一次看见嘉陵江，多么惊奇而又欢欣！清清的江水，洗去了我这个从抗日战争前线到来的年轻人身上的征尘。

重庆，那时是“陪都”。我到来时正是夏天，虽然穿的是一件夏布长衫，但赤日炎炎的山城象一座大火炉，热得我浑身流汗，好在到了夜里，当万家灯火照亮千山万壑的时候，长江和

嘉陵江送来了阵阵清风，减轻暑热，送我入梦。

那时，我住在临江门附近，离“精神堡垒”^{*}不远。

顾名思义，“精神堡垒”应是象征中国人民抗日的必胜信念的，但那时真正的精神堡垒，却在陕北延安，以及与延安一脉相通的重庆红岩村。

那时，在重庆，白天，市面繁华，人如潮涌；入夜，灯光如织，歌舞通宵，好象是一片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么战争的迹象。只有到了高竿上挂起红球，警报日本飞机临空，人们才感到战时的气氛。

当时，罗荪在主编《文学月报》，住在长江边一座石砌的屋子里。有一天我去看望他，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后，带我到七星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楼上去会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冰，是约好在这里见面的。

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楼上很破旧，黑洞洞的，墙上有裂缝，掉了不少墙皮，可能是日本飞机轰炸时被震落的。

我和徐冰是第一次见面。看来，他刚过三十岁，年轻精明，态度潇洒。那时，皖南事变不久，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朋友，迫于国民党掀起的国内反共高潮，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去香港。

徐冰要我重返抗日前线发挥作用，并且引鲁迅的话对我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不久，苏联塔斯社分社社长在冠生园举行夜宴，招待重庆少数作家，我也被邀赴宴。在座的有罗荪、叶以群、任钧等。

* 即今解放纪念碑

在宴会上，塔斯社分社社长知道我不久前才从前方来，问起前线的情况。我对国民党的假抗日很气愤，指出国民党官僚们在大后方享乐，而士兵们却在前线吃蚕豆皮，饿着肚子打仗的事实。

我重返抗日战场前夕，把一九四〇年在荆门前线写成的中篇《乌兰不浪的夜祭》整理出来，交给了罗荪，在他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作为临别礼品，留给大后方亲爱的读者。

于是我又越秦岭，再过八百里秦川，重返中原前线。

国民党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八年外侮，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和臧克家、田涛辗转中原前线，为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编辑文艺刊物《大地文丛》，不料创刊号一出版就被禁，并遭到驱逐，只得离开了抗战前线。此后我先是到了大后方成都，仍旧受到特务的盯梢、追捕，曾一度隐蔽川西邛崃山脚，然后于一九四三年秋天第二次来到重庆。

第二次到重庆，张家花园的“文协”，就是我的落脚点。文协的会址是一座二层楼的破烂房子。白天，我在街头流浪；夜里，被褥往桌子上一铺，就是我的栖宿处。

一九四〇年我还在洛阳，那时的第一战区政治部秘书长陈远湘，已调来重庆任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我刚到重庆，正在彷徨街头的时候，他就给我捎口信说，他知道我到了重庆，要我老实一点，如果出了事，他也不好办。口气温和，内含威胁。

重庆五方杂处，文艺界也相当复杂。我受到敌人的警告，却还有人造谣说我在洛阳当过国民党集中营的教官。有一天，

我到叶以群房子里去，他忽然给我沏了一杯糖水喝。叶以群有个习惯，一般人他给白开水，只有他特别尊重的人才以糖水相待。正在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叶对我受了不白之冤表示慰问，并且告诉我，有个熟人在造我的谣。这才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第二次来到重庆，会受到文艺界进步朋友冷淡的原因。

十一月间，重庆解除了暑热，长江和嘉陵江送来了微凉的江风，但山城的高岗和深谷却弥漫着灰色的雾。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前一天，叶以群告诉我，很多文艺界的朋友都将去苏联大使馆庆贺。

第二天，倒是一个好晴天，太阳高照，天地清明，好象整个宇宙也在庆贺人类地球上出现的这颗璀灿的红星。为了去庆贺这个伟大的节日，宋之的不顾脚板肿痛，也抱着崇敬的心情前往。他穿了我的布鞋，一跛一跛地领我上了重庆市中心的枇杷山。

我是第一次上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就在枇杷山上，雄踞山头，视野辽阔，长江和嘉陵江就在眼底。

在大使馆的大厅里，站着戎装的武官罗申中将。他热情地接待前来的中国朋友。大厅两侧，摆满了俄式糕点和伏特加酒。

大厅里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忽然在人群里挤过来叶以群，他把我拉到一位衣着整洁、神情和霭、风度潇洒的人跟前，指着我说：“这就是碧野。”

“呵呵，我刚读过你的《奴隶的花果》，写得好！”这个小胡子在笑声中抖动。

经叶以群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茅盾！

抗战初期，我就得到过茅盾的教导，我的第一个集子《北方的原野》，就曾受到茅盾的好评和推荐。虽然我们通过信，但现在却是第一次见面。在这第一次见面里，他第一句话就提到我不久前才发表在福建靳以主编的报纸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连我发表在偏僻地区的作品，都为他所注意这一点，就可看出他对青年作家的关怀、爱护和培养。这是多么使我感动呵！

当时，重庆有这么一首民谣：“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笑贫不笑淫。”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住劳动人民的贫穷。作家们单靠写作是很难糊口的，因此，曾经呼吁“斗米千字”运动。即写一千字要求得到一斗米的报酬。但连这个最低的愿望也终究未能实现。

好不容易，我才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业，当半个教员。所谓半个，就是课程少，薪金有限。尽管山城风高，长江浪大，只要有课，就得冒险过江去南岸弹子石江苏旅渝中学授课。遇到轮渡停航，只好乘小木船过江。小木船由老艄翁驾驶，在波峰浪谷间浮沉，浪花打到身上，湿淋淋的，耳边是风声和涛声，常常全船雅静，连大气也不敢出。

学校欺侮穷教员。本来我的课就少，满可以连排在上午或下午，以便一口气教完。但教务处却给你上午排一节，下午排一节，拴你一个整天。中午，我只好在小食担上买一碗“抄手”^{*}充饥；然后，胡乱拣一个坐地等待。记得我常到一个乱石嶙峋、

* 四川话，即馄饨。

野草丛生的山岗上去，那里能望见江上过往的轮船。那从轮船上升起的一缕缕轻烟，淡淡地抹在水空上，也淡淡地抹在我的心头上。我的心头充满凄苦和穷愁。

在旧中国，象我这样遭遇的知识分子，何止千千万！

但教书也难以糊口，我还得从事写作弥补。

我从张家花园的文协，曾先后搬迁飞来寺和两路口。住在飞来寺一角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隔墙人家烧火，烟就弥漫了我的房间，呛得我喉咙发痛；后来，我又迁到两路口的一个竹架危楼上。这危楼是用楠竹架在高坡上的，风一吹摇摇摆摆，随时都有倾倒到谷底去的危险。

居处狭窄，连铺稿纸的地方都没有，况且环境嘈杂，也静不下心来思考。幸好两路口有一座图书馆，教书之余，我就常到那个图书馆去伏案写作。图书馆冬天有火炉取暖，也较安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地方。

感谢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他们不仅没有因为我占座位写作而驱逐我，反而给我不少方便，经常给我找一个偏僻清静的角落，而且送开水给我喝。看来，他们也都是穷知识分子，同情我的境遇，“相濡以沫”。在两路口图书馆里，我写了中篇小说《大红骡子和缺犁耙》、短篇小说《山野的故事》、《期待着明天》等。阅览室的炉火暖了我的身，而一杯白开水却暖了我的心。这是我生活在山城的这段日子里使我终身难忘的人间温暖。两路口，这地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它象一支照亮我生活道路的火炬，永远鲜明，狂风吹不熄，暴雨浇不灭。

正在我为生活操劳的时候，忽然田一文领着一个衣衫破烂的赤脚老妈妈来找我。田一文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巴金的